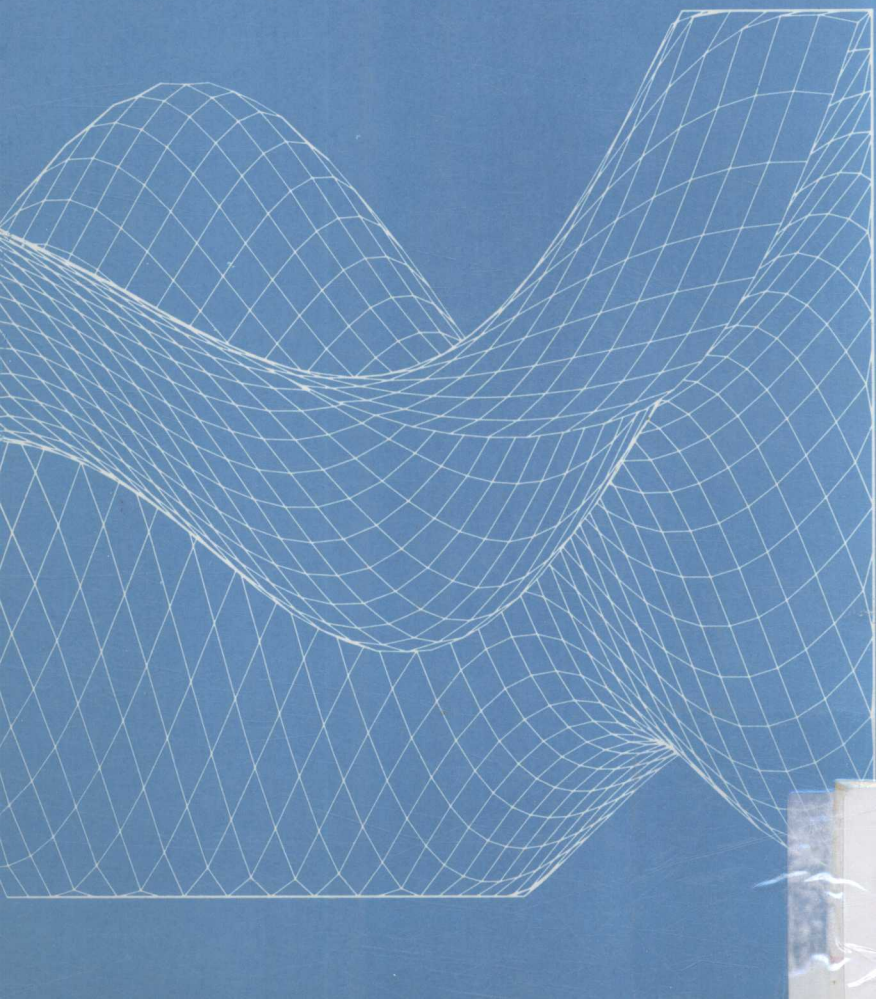


書叢報日界世

中美關係的軌跡

著／弘景王

〈冊下〉



683517

D822.3/12

721
2

世界日報叢書

中美關係的軌跡

下冊

王景弘著



90095082



世界日報叢書

中美關係的軌跡(上、下冊)

著者 王 景 弘

發行人 王 必 成

出版者 世 界 日 報 社

總經理 聯 經 出 版 事 業 公 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六一號

郵政劃撥帳戶〇一〇〇五五九一三號

電話：七六三一〇〇〇一六九三

印刷者 世 和 印 刷 廠

定價：新臺幣一五〇元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二月初版

印翻禁・權版有

中美關係的軌跡 / 王景弘著.--臺北市：聯經，
民76

2冊；21公分.--(世界日報叢書)

新臺幣150元(平裝)

1. 中國—外交關係—美國 2. 美國—外交關係—中國

I. 王景弘著

578.252/8443

美對華政策回到「冷門」

美國對華政策問題，在華盛頓似乎又回到「冷門」。

雖然一些保守派人士對雷根政策的抨擊，仍陸續出現在文鮮明集團斥資創辦的「華盛頓時報」，其他具影響力的大報紙，已經少見對華政策的報導或評論。

國會在「八一七聯合公報」發表後，雖然有一些零星的批評，大體來說，氣氛還是「平靜」。一位經常注視美國對華政策的國會助理說，連一向強烈支持台灣的早川雪參議員都為美國與中共的「聯合公報」叫好，這件事要「吵」下去並不容易。

國會對此項問題，沒什麼胃口再「吵」，那是很明顯的。參院外交委員會十六日舉行副國務卿提名人肯尼茲·達姆的任命聽證，外委會主席裴西、民主黨籍資深議員培爾，及另外兩位共和

黨籍議員，環繞地球問了幾十個問題，從軍備管制、對蘇俄關係、波蘭問題、中東問題、海洋法問題、核子擴散問題、西歐問題，直問到與日本貿易問題。一個多鐘頭問下來，沒有一個人問到對華政策問題，好像這個問題根本不存在！

參院司法委員會分權小組十七日上午為「聯合公報」、「台灣關係法」及分權制度問題舉行聽證，五位小組委員會成員，只有主席伊斯特參議員出席，從頭到尾獨撐全局。

小組委員會曾函邀國務院、國防部、白宮和司法部派高級官員作證，白宮和司法部不理會，國防部認為美國外交及憲法大計，責任在國務院與司法部，五角大廈礙難效勞。國務院還算客氣，由主管國會關係的助理國務卿摩爾回信，使一招太極拳，認為「聯合公報」只是總統的政策聲明，在國際法上並沒有約束力或義務，而其執行也要遵照所有美國聯邦的有關法律。因為「公報」只是「政策聲明」，行政部門與國會也有密切磋商，所以並沒有違越分權原則的問題。

國務院當然不肯讓舒茲國務卿作證；它只答應在二十七日由國務院的法律顧問上場應戰。

分權小組委員會聽證，雖說旨在維護美國憲法分權制度的基本原則，實際上，主要目的還在引起各界對雷根對華政策動向的注意。為此項聽證，美國保守派聯盟十六日下午還特別舉行一次酒會及專題討論會，但十七日聽證會開始，前往採訪的美國記者約有半打，等伊斯特參議員的開場白及辛姆參議員的證詞唸完，美國記者已經走了一半；前佛羅里達州民主黨籍參議員史東作證

完畢，第二批證人，安克志大使、克萊恩教授、辛頓教授及葛瑞哥教授登場，記者席已剩下中共「新華社」記者，和台北新聞機構的人員。旁聽者也所剩無幾。

這種缺乏高度興趣的現象，也反映在醞釀中的一些決議專案或法案之修正案上。

在「聯合公報」發表後，國會醞釀過幾種案子：

①高華德參議員所提，附加在提高債務限額法案的修正案：「任何法律或條約，未經參院批准，不得判定，修訂或中止。」這項修正案只作基本原則的宣示，並不明提「台灣關係法」，或涉及對華政策的字眼，但其目的在保障「台灣關係法」，及防範行政部門片面採取行動，以變更現行之「台灣關係法」，那是很明顯的。

②新罕布什州共和黨籍參議員韓福瑞擬議的決議案：「總統不得採取任何不符合台灣關係法之行動，或拒絕採取台灣關係法之意向與規定之行動，特別是涉及提供防禦性軍備與勞務，及其他與安全有關之規定」。這個案子能發展到什麼程度，仍看參院日程及議員反應而定。目前誰也沒把握。

③有人建議出奇兵，不採取反對「公報」的態度，而是採取「積極」手法，以支持雷根總統片面聲明的方式，確定美方對「聯合公報」的解釋，以牽制行政部門。但這種主張不夠火辣，保守派並沒胃口，而溫和派也不帶勁。

④有人主張抓住助理國務卿何志立的證詞，重申美國對台灣的六項保證：美國對台灣軍售不設限期；對台灣軍售事先不與中共磋商；美國不迫使台灣與中共「和談」，也不擔任「調人」；美國不修改台灣關係法；以及美國拒絕承認中共對台灣的主權。但這個案子也沒有進展。

為什麼問題又成「冷門」？最主要的因素是一般的看法認為這個問題至少暫時已經解決。中共與美國的緊張關係已緩和；中共對台灣也沒有擺出劍拔弩張的姿態；而美國對台灣軍售又開始按部就班移交。有不少國會議員為此項「公報」叫好，便是看在眼前的「兩全其美」，認為事情已經「過得去」。

國會會期所剩無幾，也是一個主要因素。照目前的計劃，國會可能在十月初便休會。眾院議員，人人為競選連任，已經忙得不可開交。原應邀在分權小組聽證會中作證的紐約州共和黨籍眾議員索羅門，臨時也告缺席，只提書面證詞。參院方面則為反墮胎問題，學校禱告問題大打爛仗，有幾人還顧得生米已成熟飯的「聯合公報」？

國會為這件事情吵不起來，行政部門，特別是國務院，更樂於把事情冷卻，擱置一邊，最好不要再提，雖說國務院已同意若干軍售的時序表，但它還是刻意安排，不願再沒有必要的去刺激中共。一碰到有關對華政策問題，國務院發言人的標準答案是：請參閱美國與中共的「建交公報」及最近的「八一七聯合公報」。如果還嫌不夠清楚，標準答案是：參酌「國務院高級官員」在八

月十七日所作的背景簡報。

美國記者碰兩次這種「答案」，自然意興闌珊。看樣子，美國對華政策問題又要冷卻一陣！

一九八二年九月

美國對華軍售的原始立場

卡特政府承認中共時期擔任白宮安全會議幕僚處對華政策顧問的奧森柏，在一篇剛發表的文章中指出，美國與中共談判建交時，美方並未承諾限期截止對台灣軍售，或在未來對軍售加以削減。

不過，奧森柏說，美國立場所暗示的意義是：美國對台灣軍售的質與量，將與中共對台灣問題的態度相聯結，也就是說，依邏輯的推演，在情勢緊張減低時，美國對台灣軍售將會降低。

現仍擔任密歇根大學教授的奧森柏，在「外交季刊」秋季號發表「中（共）美關係十年回顧」，除敘述雙方關係的演變外，並透露雙方談判的主要過程。

奧森柏在文章中說：遠在進入白宮之前，卡特便下定決心，只要他深信台灣和平、繁榮的前

景不受危害，他便要承認中共。一九七七年六月，卡特決定向中共要求三項保證：第一，關係正常化不能阻止美國以武器售予台灣；第二，美國人民將得以繼續與台灣人民維持不受損害的非官方文化、經濟及其他關係；第三，在關係正常化宣佈時，美國方面將發表一份片面，但不受反駁的聲明，表示它對於台灣問題將以和平方式解決的期待。這三個條件是從尼克森和福特政府與中共談判的紀錄中整理出來的。

奧森柏當時已經在白宮安全助理布里辛斯基的手下當中國事務顧問。他在文章中說：卡特在七月三十日接見國務卿范錫，給予訪問中國大陸的指示時說：「把話對他們（中共）講清楚，如果中共接受這些條件，他準備雙方關係正常化，如果他們不願意，那就算了。」

范錫把八月訪平之行，極認真對待，他隨身帶了建交公報草案，並經授權，如果中共對他的陳述作出有利反應，可以立即提出，並進行談判。但因為在范錫訪問北平前，巴拿馬運河問題在參院發生爭執，卡特不願為「關係正常化」事宜折損他在巴拿馬條約上的支持票，結果，范錫在北平並未把美方立場全部交代，只說明在建交後，美方將有政府人員派駐在台灣的非官方機構服務。

中共方面，因為在范錫啟程訪問之前，報紙引述政府人士說，中共對台灣問題的立場具有「彈性」，致中共一開始便採取對立而非妥協姿態。

經過幾個月之後，中共又放出緩和信號，並在國務院與白宮之間操縱取利。他們決定邀請國家安全助理布里辛斯基訪問北平。

奧森柏透露，一九七七年十月，美國駐北平聯絡辦事處主任伍考克要求國務院給予訓令，以告知中共，在關係正常化之後，美國方面在台灣的代表問題，不是一個障礙。一九七八年二月，卡特接見伍考克，並全力支持伍考克要依一九七七年六月所定之原則進行關係正常化的決心。

在此同時，國務卿范錫和主管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霍布洛克提出一份報告，認為美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之「窗」，將在一九七八年國會選舉之後打開，一直到一九七九年，此後則受兩個因素的限制：①預料中參院將為第二回合限武協定的辯論；②一九八〇年的總統選舉。

四月間，美方仍未決定是先簽限武協定，或先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但卡特在布里辛斯基訪問北平前作成決定：美國將在六月開始與中共談判關係正常化問題。五月間，布里辛斯基訪問北平，便把美方訊息帶過去。卡特的假定是，到八月間，美國與蘇聯關係將有所改善。限武協定既成，美方能同時改善與蘇俄及中共關係自然有利。

奧森柏說，布里辛斯基訪問回來，卡特在六月二十日的一次會議中便指令幕僚人員，以十二月十五日為宣佈關係正常化的日期，但不把此項時間表告訴中共。美方的談判策略是要伍考克慢慢的跟中共一個問題一個問題談。最敏感的問題先擱下來，把雙方可以談攏的問題先談。

他說，在這談判期間，美國與中共實際上有三條對話通道，第一條是伍考克與中共外交部的談判；第二條是白宮安全顧問與中共聯絡辦事處主任韓敘及柴澤民的全球性問題交換意見；第三條則是助理國務卿霍布洛克接受中共方面有關對台灣軍售問題的抗議。第三條實際上是作為中共的出氣孔，使另兩條通道不受阻礙。

奧森柏寫道：在九月十九日，卡特會晤柴澤民，堅持美國方面將繼續以謹慎選擇過，對中共不構成威脅的武器售給台灣，這是談判中已重複多次的辦法。十一月二日，卡特指令伍考克通知中共方面，美方考慮以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為建交日期。而中共方面也在十二月四日間接向伍考克表示，他們也考慮一月一日為建交日期，同時，鄧小平將親自介入談判。

伍考克獲通知，鄧小平定十二月十三日接見他；這時，布里辛斯基才首次和柴澤民提到雙方在北平的談判。為使十三日的談判更有效果，布里辛斯基在十一日提請中共方面注意，伍考克將邀請華國鋒或鄧小平在一月間訪美，同時也提出一份修改過的建交公報。（伍考克在十一月初提出第一份草案，中共則在十二月四日提出第二項草案。）十二月十三日，鄧小平接受美方邀訪，並談判公報草案。

奧森柏說，因為美方要把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依通知後一年廢止的方式予以中止，鄧小平遂要求美國在一九七九年停止出售武器給台灣。伍考克的報告使卡特相信再談一次便會有結果，他

怕消息走漏，使他向公眾辯護此項政策時失去先機，所以決定速戰速決，如期在十五日宣佈。為此，伍考克在十四日兩度會晤鄧小平，一方面告知卡特在十五日宣佈，另一方面再檢討公報文字。伍考克轉達卡特的話說，美方願意接受中共的要求，在一九七九年停止新軍售一年，但是軍備零件，及已批准出售中者不受此限制。

他透露，因為華盛頓有人擔心中共可能誤解對台灣暫停軍售一年的意思，認為美方有意在一年以後也要停止軍售，遂要伍考克再與中共方面會晤，徹底說明美方立場。伍考克把卡特在九月十九日的方式再重述，中共也同樣表明美國對台灣軍售是妨礙其主權，不能接受。至此，談判紀錄很清楚；雙方對此最困難的問題並沒有協議。為使雙方關係能正常化，此項問題被擱下暫時不談。中共方面保留隨時可以重提的權利，美方則表示相信的關係正常化之後，將逐漸有較好的環境來討論此項問題。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日

布酋死後的美俄中共三角關係

過去一年來，蘇俄領袖的重要外交政策演說，很像美國政府官員在七十年代的老調：每次總要提到改善與中共關係的重要性，及誓言要為改善雙方關係，盡最大努力。

今年春天，蘇共第一書記布里茲涅夫在塔什干向中共招手，呼籲雙方關係正常化。中共也開始半推半就，對蘇聯的主動有所反應，學術、體育團體恢復交往。八月間，中共主管蘇聯事務的官員訪問莫斯科，對雙方恢復會談進行安排。

布里茲涅夫九月在巴庫發表的政策演說，又重申促進雙方關係正常化的決心，公開呼籲雙方進行會商。他表示，蘇聯對關係的正常化，及逐漸改善與中共之關係極為重視。

在他去世前兩週，布里茲涅夫對蘇聯紅軍頭目訓話，以不尋常強硬的語氣攻擊雷根政府，指

控美國在政治、思想、和經濟上對社會主義進行攻勢，提高軍事準備，及在黎巴嫩、非洲、亞洲、中南美各地擴張勢力。他認為在這種局面上，蘇聯與其他國家的關係如何改善是重要問題，其中很重要的是與中共的關係。他說：「我們真誠的要與中國（共）關係正常化，並竭盡所能以達此目的。在北京，他們也說關係正常化是合宜的。中國（共）的外交政策目前尚無重大改變，但是，新出現的事物，我們不可忽視。」

布里茲涅夫對紅軍頭目的演說，是在蘇聯與中共初步會談結束之後。雙方這回合談判並無結果，下回合可能在莫斯科恢復。但是，現在布里茲涅夫死亡，克里姆林宮繼承問題還需要一段時間鬥爭，此項變局是否將影響蘇聯與中共間的關係？雙方是否會繼續摸索關係正常化？或雙方謀求調整關係的努力，因為布里茲涅夫的死亡，而將告擱淺？

要回答這些問題，可能需要先檢討布里茲涅夫向中共呼籲關係正常化的背景。布里茲涅夫此舉可以解釋為蘇聯全盤和平攻勢的一部份：有些觀察家認為克里姆林宮對雷根政府的估評，確信要與這個保守派政府妥協，已經沒有可能，因此，它要糾合所有能糾合的力量，也分化它所能分化的美國與盟邦關係，希望藉此對美方形成壓力，也等待新政府出現。

在這套構想下，蘇聯在西歐可以利用的是和平運動，在亞洲最方便的是中共為美國對台灣軍售問題，雙方發生新爭執，中共對雷根政府的信賴打折扣。布里茲涅夫的幾次重要演說，背後配

合的是蘇聯宣傳工具為美國對台灣軍售問題，對華盛頓的抨擊，和對中共的支持。這些宣傳工具完全照中共的說詞，聲稱台灣主權屬中共，美國繼續出售武器給台灣，干涉中共的內政。

有些美國分析家，對蘇聯一再向中共招手，持另一套解釋：他們認為這是布里茲涅夫向蘇聯軍方的壓力低頭，照這套理論，蘇聯紅軍頭目認為長期在中蘇邊界、西伯利亞及外蒙部署重兵，並沒有必要。他們希望與中共關係能改善，使駐西伯利亞的兵力減少。這種說法當然不容易找到直接證據，但以現實環境而論，這還是一項合理的解釋。

如果布里茲涅夫的和平攻勢動機屬於上述三種解釋的任何一種，或三種的合併，則布里茲涅夫過世，對克里姆林宮的「中國政策」，應該不會有大影響。布里茲涅夫的領導方式，還是依賴蘇共政治局的共同意見；新的接班人出現，不管是暫時性的集體領導，或個人鞏固領導地位，克里姆林宮在此項問題上無法、也沒有必要急於改變。

實際上，布里茲涅夫也不是阻礙雙方關係正常化的因素。黑魯雪夫與毛澤東爭世界共黨領導權，兩人形同水火，多少也助長了雙方的分歧。黑魯雪夫垮台，妨礙雙方關係的人之因素，實際上也已消失。布里茲涅夫在與中共關係上，並沒有不利的瓜葛，而雙方關係無法改善，主因還在歷史、文化，及對世局的觀點上。中共接受布里茲涅夫的呼籲，探討雙方關係正常化的途徑；在此項過程中，北平認為雙方關係的主要障礙是蘇聯在邊境陳兵，蘇聯進軍阿富汗未退，及蘇聯支